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最后岁月

沙舟

1924年1月21日晚上6时5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与世长辞。

接着斯大林在1月26日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悼列宁》的演说。他眼里蓄满了泪水，不止一次地说道：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珍重党员这个伟大称号，并保持这个称号的纯洁性。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要保护我们党的统一，如同保护眼珠一样，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要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我们也一定不遗余力来光荣地执行你的这个遗嘱！”

“……”^①

如果说，斯大林在这里所说的遗嘱尚是广义上对于列宁思想的某种概括的话，我们还可以看到，1927年10月23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确实发表了关于列宁“遗嘱”的言论。他说：“列宁的‘遗嘱’是给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的这个‘遗嘱’已在代表大会上宣读过。”说党隐瞒这些文件那是无耻的诬蔑。“反对派竭力拿列宁的‘遗嘱’当王牌，但是只要读一读这个‘遗嘱’就会明白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当王牌。相反地，列宁的‘遗嘱’致命地打击了反对派现在的首领们。”^②斯大林的这篇发言以《论反对派》为题收入《斯大林全集》里。他的主旨是驳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反对派的。因为季诺维也夫在这次会议上揭露：“我看到过国家政治保卫局在共产党员那里进行搜查的记录，在没收的‘罪证’中几乎总有列宁的遗嘱”他厉声责问：“为什么列宁的遗嘱成了非法文件？”^③

而到30年代在大规模镇压开始后，列宁的“遗嘱”被宣布为伪造品，手中保留这份文件的人绝大多数都被镇压了。他们被判处长期监禁或死刑，只是因为保存了“反革命文件”，即所谓列宁的“遗嘱”。而幸免于难的人宁愿把这个文件销毁掉，以免招致灭顶之灾。

对于列宁的“遗嘱”，先是说有，后又说无，反对派把“遗嘱”当作一张王牌，斯大林则说“遗嘱”致命地打击了反对派；

① 《斯大林全集》第6卷第42~45页。

② 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575~577页。

③ 李忠杰：《苏联十大历史公案》，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列宁“遗嘱”=反革命文件 保存“遗嘱”=犯罪。如此扑朔迷离 大惑不解 是是非非 恩恩怨怨 说明所谓列宁的“遗嘱”不仅是一个历史之迹，而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

那么，列宁到底留没留下遗嘱？真相究竟何在？

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最后岁月

要弄清楚列宁“遗嘱”的来龙去脉，需要从列宁病中的经历说起。

1921年冬天，列宁出现了重病的初期征候，不得不愈来愈经常地停止自己的活动。特别紧张的工作损害了列宁的健康，被刺受伤的后果也表现出来了。1922年5月26日列宁的动脉硬化症第一次严重发作，他的右臂与右腿功能失调，说话也受到了影响，到距莫斯科40公里的哥尔克村长期休假。这件事打乱了苏联的整个政治生活。

列宁得病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为了把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托洛茨基排除出最高领导层，立即组成了“三驾马车”负责全盘工作。以后列宁的病体逐步得到恢复并于10月2日回到莫斯科重新掌握全盘工作；“三驾马车”也就退回到助手和执行者的地位。

当列宁恢复工作之后，他感到十分惊讶的是，在他患病的几个月里，党的机关，特别是斯大林本人非常迅速地扩大了权力。在领导层中，错综复杂的关系无不涉及到列宁，他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发现自己也越来越难于贯彻自己的意志，因此列宁不得不作出艰苦的努力，陷入了病中的苦斗。

病中的列宁先后遇到 4 个棘手的问题。

第一个是外贸垄断问题。早在 1918 年 4 月 苏俄人民委员会就颁布了对外贸易国有化的法令，确定了对外贸的垄断制。列宁始终强调对外贸易垄断的重要性，把它看成是确保苏维埃国家经济独立的重大措施。但从 1921 年起 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扩大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领导人在对于外贸垄断的必要性问题上出现了意见分歧。索柯里尼柯夫、加米涅夫主张放宽贸易垄断，整个领导层都在进行外贸垄断问题的争论，这直接影响到同外国资本家进行的业务谈判。1922 年三五月份，列宁先后写信给加米涅夫和斯大林，重申对外贸易由国家垄断的原则不容更改。政治局接受了列宁的意见，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定草案。但这之后由于列宁遭到第一次中风的打击长时间不能工作，反对外贸垄断的意见又占了上风。十月中央全会在列宁缺席的情况下通过一项决议，决定限制国家对外贸易垄断的范围。列宁得知情况后，不同意全会的这一决定，他与斯大林谈话，要求延期两个月再作决定。多数中央委员同意列宁的意见，但斯大林在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说，列宁没有说服他，然而由于列宁的坚决要求，他投票赞同延期。季诺维也夫则声明坚决反对重新审查这一问题。10 月 16 日 中央委员会以 14 票对 1 票就列宁的建议通过决定：“延至下次全会决定这一问题。”

列宁在延期决定的两个月中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外贸状况的材料，成立研究这一问题的委员会，与各位中央委员交换意见等等。但 12 月 13 日 他的旧病再次发作。列宁感到最重要的是必须寻找一个能在全会上代表他的辩护人。他知道

托洛茨基的观点与自己一致，因此他接连写了 3 封信给托洛茨基，同他交换意见。信中写道：“不管怎样，请您务必在即将召开的全会上出面维护我们的共同观点，即保留和加强对外贸易垄断制是绝对必要的。”我认为，我们完全谈妥了。请您在全会上声明，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①与此同时，列宁电话口授了给斯大林并转中央全会的信，提出了自己拟在全会上发表的意见。列宁说：“我还同托洛茨基谈妥，由他来维护我在对外贸易垄断问题上的观点。”我相信，托洛茨基维护我的观点，一点也不比我差。”^②

12月18日的中央全会接受了列宁的意见，同时撤销了十月全会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卧病在床的列宁为这一成功而感到高兴，他口授了致托洛茨基的信表示祝贺：“好象仅仅调动了一下兵力，就一枪不发的拿下了阵地。我建议不要停顿，要继续进攻……”

列宁遇到的第二个棘手的问题是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的问题。

俄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十月革命后，俄国的各民族地区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苏维埃共和国。根据列宁关于民族自治的原则，苏维埃俄国承认了这些共和国的独立。国内战争时期，由于反对外国武装干涉和平定国内判乱的需要，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建立了军事、政治联盟。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各共和国之间的联合趋势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而进一步加强。俄

^①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07~308页。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34页。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2页。

罗斯联邦首先与各苏维埃共和国之间建立了条约关系，随后各苏维埃共和国进一步提出了成立统一的联盟国家的问题。

成立联盟国家的核心问题是采取什么样的国家结构。根据政治局的建议，俄共（布）中央组织局成立了一个由斯大林主持的委员会，专门研究这一问题。其成员有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拉柯夫斯基、索柯里尼柯夫以及各民族共和国的代表。斯大林是格鲁吉亚人，十月革命后，他一直在苏维埃政府中担任民族人民委员会的职务，因此由他担当此任是其自然的选择。

不久，斯大林拟就了一份《关于俄罗斯联邦和各独立共和国的相互关系》的决议草案 即著名的“自治化计划”。当时独立存在的苏维埃共和国共有 6 个，它们是 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按斯大林的意 见，不是要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而是建立包括一切民族共和国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草案的基本点就是让乌克兰等 5 个共和国均以自治共和国的身份加入俄罗斯联邦。俄罗斯联邦本身就是由俄罗斯民族各州与十几个少数民族自治共和国组成的，显然，这是从各共和国之间已经形成的关系上倒退了一步，存在着严重的大俄罗斯倾向。“自治化”方案虽遭到了几个共和国的反对，仍然在委员会上得到通过，并在没有征得列宁同意和政治局研究的情况下，分发给了中央委员。列宁知道后，写信尖锐地批评了斯大林的立场，并提出了完全不同的建议——建立一个新的国家组织，特殊的国家类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它在各共和国自愿联合又保留各自平等权力的基础上组成，并

选出全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为各平等共和国的政权机关。

斯大林给列宁和政治局写了回信，除接受了各共和国平等联合的一条意见以外，对其他意见全部予以驳回，他并以列宁的批评“操之过急”一词来回敬列宁，说“列宁同志自己有些操之过急，这种操之过急的做法将会助长‘独立分子’而使列宁同志的民族自由主义受到损害。”^①

1922年10月6日，俄共（布）中央全会讨论俄罗斯和各独立的共和国的关系问题。列宁因牙病未能出席，但他给加米涅夫写了这样一张便条：

“加米涅夫同志 我宣布我要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决一死战。我那颗该死的牙齿一治好，我就要用满口好牙吃掉它。

要绝对坚持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由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

格鲁吉亚人等等轮流担任主席。

绝对！”^②

据说，在这天的会议上，加米涅夫与斯大林交换了一张条子。加米涅夫写道：“伊里奇宣战保卫独立。”斯大林回答：“我想，我们对列宁应当强硬。”尽管如此，中央全会仍然通过了以列宁的意见为基础写成的决议，把它作为中央委员会的指

《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3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16页。

令，并委托以斯大林为首的一个新的委员会起草关于成立联盟的法令草案。1922年12月30日联盟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通过了成立宣言和条约，从而正式宣告了苏联的诞生。

但是，无论对于斯大林还是列宁来说，事情都没有完结。随之而来的就是由成立联盟派生出来的“格鲁吉亚事件”。

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都属于外高加索地区。国内战争后都成立了独立的共和国，但其党组织都属于俄共（布）。在俄共（布）中央与3个共和国中央之间，还有一个以奥尔忠尼启则为首的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1922年3月12日这3个共和国联合组成了外高加索联邦。但是格鲁吉亚的党中央对此一直有不同意见，他们与奥尔忠尼启则以及背后的斯大林等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以致莫斯科的代表甚至说，要“使用烙铁”把格鲁吉亚中央委员的民族主义倾向烫平。理所当然，这次他们也强烈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计划”。以后的俄共（布）中央全会虽然通过了按列宁的意见修改过的决议，但这个决议已对列宁的原来意见打了一个折扣：规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3国要作为一个外高加索联邦，而不是分别直接加入即将成立的苏联。这一点受到以姆季瓦尼为首的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的坚决抵制。奥尔忠尼启则对格鲁吉亚采取了高压政策，给格共中央领导人奥库查瓦、钦察泽、马哈拉泽以党内警告处分，解除了奥库查瓦在党内的职务，并宣布对格共中央“不信任”。在这种情况下，格共中央向俄共（布）中央上告，并宣布格共中央委员会集体辞职。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会立即接受了这一辞职，并成立了以罗米那兹为首

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更有甚者，奥尔忠尼启则竟当着李可夫的面动手打了格鲁吉亚领导人卡巴希泽一记耳光。

列宁起初曾对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持怀疑和批评态度，甚至他曾在一封措词尖锐的电报中批驳了格鲁吉亚领导人向斯大林和奥尔忠尼启则提出的十分激忿的抗议。但是局势的发展逐渐引起了他的注意和不安。他责成政治局把事件的真相了解清楚，指定了一个由捷尔任斯基为首的委员会前往格鲁吉亚调查。列宁对捷尔任斯基能否不带倾向的调查事实表示怀疑，因此又派李可夫也去调查，并要求亲自向他执行。1922年12月12日，当列宁得知奥尔忠尼启则在格鲁吉亚的专横行为时，非常气愤和忧虑。12月13日列宁即两次发病。14日，列宁打算就民族问题授一封信，但未能实现。12月30日、31日，正值宣告苏联成立之际，列宁口授了题为《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信。

信中写道：“根据捷尔任斯基同志说的情况，我只能感到莫大的忧虑。事情发展到奥尔忠尼启则竟会动手打人，那么可以想象得出我们已掉到什么样的泥潭里去了。显然这种‘自治化’计划是根本不对的，是根本不合时宜的……我想，在这里，斯大林的急躁和喜欢采取行政措施以及他对臭名昭彰的‘社会民族主义’的发脾气起了决定的作用……”列宁紧接着写道：“如果一个格鲁吉亚人蔑视事情的这一方面，轻蔑地滥用‘社会民族主义’这个指责，其实他自己不过是真正地道的‘社会民族主义者’，而且是粗暴的大俄罗斯的杰尔治摩尔达杰尔治摩尔达——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一个愚蠢粗野、动辄用拳头打人的警察。——作者注）这

个格鲁吉亚人实质上破坏了无产阶级的阶级团结和利益。”列宁还提出了应当采取的具体措施，指出“需要处分奥尔忠尼启则以儆效尤”，“并要补充调查或重新调查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全部材料，以便纠正其中无疑存在的大量不公正的和不公正的判断。当然，应当使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对这一真正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的运动负政治上的责任。”^①

1923年1月25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捷尔任斯基偏袒奥尔忠尼启则指责格鲁吉亚党中央的结论。列宁获悉后，非常生气，他要求把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材料交给他进行研究，以备在即将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上使用。

直到列宁最后一次发病的前夕，列宁还就格鲁吉亚事件口授了两封信。一封信是1924年3月5日给托洛茨基的信中说：“我请你务必在党中央为格鲁吉亚事件进行辩护这一事件现在正由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审理’，但是我不能指望他们会秉公处理，甚至相反。如果您同意出面为这一事件进行辩护那我就放心了。”^②另一封信是3月6日给姆季瓦尼、马哈拉泽等人的，他说：“在这个事件中我同你们全心全意地站在一起，对奥尔忠尼启则的粗暴、斯大林和捷尔任斯基的纵容姑息感到愤慨。我正在准备笔记和发言稿为你们说话。”^③如果说在对外贸易垄断和成立苏联的问题上，列宁和斯大林之间主要是工作上的分歧，列宁相信能够说服斯大林改正错误，而在处理“格鲁吉亚事件”时，列宁认为再也不能同斯大林达成

① 《列宁全集》第43卷第354页。

②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3页。

③ 《列宁文稿》第10卷第315页。

妥协了。对此 列宁的秘书福齐耶娃证实说：“伊里奇不相信斯大林，他要在全党面前公开反对他。他正在准备一枚炸弹。”^①然而，严重的中风终于使他未能如愿。

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关于党政机构的官僚主义问题。

苏维埃政权建立一年半之后，列宁开始认识到官僚主义已部分地复活起来。到了列宁生病时期，他发现，当他不在的时候，党政两部机器无法协调地工作，国家领导干部不是不负责任就是互相推诿。因此，列宁在许多文件中一再强调反对官僚主义。列宁说道：“我们内部最可恶的敌人就是官僚主义者，这些人都是身居苏联要职、出于勤勤恳恳而受到大家尊敬的共产党员。”^②

列宁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突出的是关于工农检查院的问题。工农检查院的前身是 1918 年建立的国家监察人民委员部。该部于 1919 年进行改组，成立了由斯大林任人民委员的新的国家监察部。1920 年 2 月，国家监察部又同当时的工农监察机关合并为工农检查院。到 1922 年春天 该院都一直是由斯大林负责的。1921 年 3 月举行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规定“监察委员会的任务是根绝官僚主义、个人野心和党员滥用党的苏维埃职权等使人坠落的罪恶……”列宁曾对工农检查院寄予很大的希望，并在很长的时间内对它加以维护。但在患病期间，列宁对工农检查院越来越感到失望，以至于最后他直言不讳地说：“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大家都

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 年版，第 471 页。

《列宁全集》第 43 卷 第 14 页。

知道，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得更糟的机关了。^①

1923年初，对于那些了解政治局势的最高领导人来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斯大林利用自己担任党的总书记和负责组织局工作的有利条件已把“自己的人”安插到党和国家机关的各个岗位，从而急速地扩张了自己的权力，这种趋势使列宁感到震惊。

据托洛茨基：有一次，列宁把托洛茨基叫到克里姆林宫他的住所，谈到了苏维埃机关内官僚主义的可怕发展，谈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他建议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并要求托洛茨基积极参加。托洛茨基回答说：

“弗拉基米尔·依里奇 我深信在目前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斗争中，我们不能忽视目前这种情况，在中央和各省，正在根据对某些党内有权势的人物和中央委员会本身内部的统治集团的忠诚，非常特别地挑选官员和专家，党员和非党员，担任甚至是区域和地方的职位。只要你向一个小官员进攻，你就会碰到一个重要的党的领导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不能担任这个工作。”

列宁想了一会儿后说：

“换句话说，我是在建议发动一个反对苏维埃国家机关内官僚主义的运动，而你是在建议把这个斗争扩大到包括党组织局的官僚主义在内？”

对此 托洛茨基回忆说：“这使我感到十分突然 以致不得

不笑了起来，因为列宁如此完美无缺地表述了这种思想，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托洛斯基回答说：

“可以认为 情况就是如此！”

“那好吧 我建议与您结成联盟。”列宁说道。

“与一个正直的人结成联盟 这是件愉快的事。”托洛茨基回答。

当时协议：列宁提出一个关于成立一个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的建议 以反对“一般的”官僚主义 特别是组织局内的官僚主义。列宁答应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的细节。这样他们就分手了。

不管托洛茨基的记载是否完全准确，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宁对于官僚主义的问题十分关注，他在与托洛茨基谈话中提到的重大措施，其中或者主要是针对斯大林的。

列宁对处理上面提到的四个棘手的问题，是充满信心的。医生认为，列宁的健康状况不会持久，但列宁并未被告知，而其他中央领导人是清楚的。为“列宁之后”的到来 苏联政治斗争已开始出现微妙的迹相。

病榻“日记”

1922年10—12月 是列宁在克里姆林宫的最后日子 他是那样紧张地工作着，甚至可以说是艰苦地奋斗着。1922年12月13日 列宁的旧病发作。15日深夜至16日凌晨 病情进

列夫·托洛茨基：《斯大林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资料室编印，1963年版 第475页。

一步恶化。23日 列宁的右臂和右腿陷于瘫痪 不得被固定在床上或一张轮椅中。这一天，列宁离开了克里姆林宫，又回到叫做哥尔克村的别墅里养病，直到病逝。他已不能写作，但幸运的是，他恢复了说话的功能，虽然有点含糊，但可以通过秘书记录下来。他当时预感自己活不长久了，因此更加关注党和国家的命运。在从此以后直到他最后一次发病（1923年3月10日）的近3个月里，列宁通过口授方式完成了他的最后著作。他把“口授”记录称为他的“日记”因为医生对他的工作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列宁大概认为，取名“日记”这样一个名称，较容易获得医生的应允。

12月23日 列宁请求医生允许他口授5分钟时间 用速记记录。他说 因为有一个问题使他感到不安 他怕睡不着觉。得到允许后 列宁叫来沃洛季切娃 对她说：“我想向您口授一封给代表大会的信 请记吧！”

这天 他口授了《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一部分。现摘录如下：

（一 给代表大会信

我很想建议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对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一系列的改变。

我想把我认为极重要的一些想法同你们谈谈。

首先我建议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我想 假如事情的发展不是对我们十分有利（我们是不能作这样指望的）假使我们没有实行这种改革，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就会遭到很大的危险。

……至于第一点，即增加中央委员的人数，我想 为了提高中央威信 为了改善我们的机构 为防止中央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全党的前途产生过太大的影响 这样做是必要的。

我想，我们党完全可以要求工人阶级有 50—100 个中央委员，工人阶级也可以不太费力地拿出这样多的人来。

这种改革会大大增强我们党的巩固性，并使它容易在敌对国家中间进行斗争。在我看来 这种斗争在最近几年内一定会大大尖锐化。我想 采取了这样的措施 我们党的稳定性将增强千倍。

列宁 1922 年 12 月 23 日^①

次日（24 日）列宁要求继续口授。然而无论中央政治局还是医生都不愿让他这样做。列宁只得提出“最后通牒”允许他每天哪怕用最短的时间口授他的《日记》，否则他就完全拒绝治疗。在斯大林、加米涅夫、布哈林同医生们协商后 作出如下决定：“1. 授予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每天进行口授 5—10 分钟的权利 但这不应该具有通信性质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也不应指望这些记录获得答复。禁止接见访问者。2. 不论是朋友或家人，都不应把任何政治生活的消息告诉弗拉基米尔

^① 此处与以下所引《给代表大会的信》的内容，均见《列宁全集》第 43 卷，1987 年 2 版，第 337—343 页。

·伊里奇，免得这些材料会引起他的思虑和不安。”^①

当晚 列宁把沃洛季切娃叫到住所 口授了 10 分钟。口授之后，列宁向她发出了保密的指示。对此，沃洛季切娃在日记中写道：“他告诫说 昨天和今天口授的内容是绝对保密的。他再三强调了这一点。他要求口授的一切，放三个特殊地点特别小心地保存起来 认为是绝密。”

25 日 列宁继续向沃洛季切娃口授《给代表大会的信》的第二部分。

(二)口授记录(续),1922年12月24日

我上面说到的中央委员会的稳定性，是指防止分裂的措施 这种措施一般是可以采取的……

我们党依靠的是两个阶级 因此 假如这两个阶级不能协调一致 那党的不稳定性是可能产生的 它的垮台也是不可避免的。一旦发生这种情况 采取这种或那种措施 一般地来议论我们中央的稳定性 都是无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措施都不能防止分裂。但是我希望 这是遥远的未来的事 也是极难以置信的事。

我说的稳定性是指保障在最近时期不闹分裂，我打算在这里分析一下对纯粹个人特性的一些看法。

我想 从这个角度看 稳定性的问题基本在于斯

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在我看来 分裂的危险，一大半是由他们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而这种分裂是可以避免的，在我看来，避免分裂的办法之一，应该是反映中央委员的人数增加到 50 人到 100 人。

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 掌握了无限的权力 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另一方面 托洛茨基同志 正象他在交通人民委员部问题上对中央进行的斗争所证明的那样，仅具有卓越的才能 也许他还是现在中央中最能干的人 但是他过分自负 过分热衷于事情的纯粹行政方面。

现时中央两位卓越领袖的这两种品质会无意中造成分裂 如果我们党不采取措施防止 那分裂是会突然来临的。

我不打算再评述其他的中央委员的个人品质了。我只提醒一下 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十月事件当然不是偶然的，但是这种事件也可以不要太多去归罪于他们个人，正如非布尔什维主义可以不必太多归罪于托洛茨基一样。

在年轻的中央委员中，我想就布哈林与皮达可夫谈几句。在我看来 他们是最卓越的力量 在最年轻的力量中)对他们应当注意下列情况 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可贵的理论家，他也应当被认为是全党所喜欢的人物，但是要把他的理论观点算作完全马克思主义的 那是很值得怀疑的 因为在他的理论观点里面有一种烦琐哲学的东西 (他从来没有学过辩